序

说来已经有三年了，当年“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在国家领导人的鼓励及支持下成立起来，本着发扬及推动我国的文化、文物及教育三大范畴为宗旨，厘定一套十年的初步资助计划，希望藉此一点点绵力，可以惠及一些由来稍为被人忽略了的学术及文化领域。

我们基金自从启动以来，一直获得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简称统战部）悉心的指导及提点，贯彻地运用我们的资源及组织能力，有效率地达到国家目前最迫切的需求，这一点我谨代表公司及家族向统战部致以衷心的感激。

有鉴于基金既定的宗旨，统战部推荐了一项资助中华文化学院的计划。这包括在文化学院举办每年两次、每次为期四个月的基本英语培训课程，对象是全国各省、市的单位主管。这项计划自实施以来备受广泛欢迎，肄业者已达数百人。

2003 年年底，当一切渐上轨道，文化学院领导遂向基金建议举办一项名为“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中华文化系列讲座”，董事会经过考虑，认为符合基金推动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化及教育的既定原则，便欣然接纳提议，讲座终于在2004年年初开锣。在这个年度，总共举行了五讲，涵括了文化哲学、科学与经济的相互关系、音乐、文学和京剧的探索。讲者方面，皆是社会上博学有识之士，经文化学院推介，然后由基金确认作实。迄今为止，除了2004年的五讲以外，2005年至今为止还举办了另外七讲。

放翁诗有云："流年不贷人，俯仰遂成昔。"倘若我们不好好地把握机会记录下这些宝贵的文化讲座，瞬眼间便无从着手整理了。这册命名为"中华文化系列讲座：甲申年说"的图书出版，目的便是负上这个使命，尚希社会各界贤达指点，以便日后作出检讨及改进。

新鸿基地产郭氏基金主席
郭炳湘
乙酉年冬于香港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

主讲人：金开诚



金 开 诚

1932年生，江苏无锡人。

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副主席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

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文化学院副院长

华夏文化纽带工程副主席

传统文化与古为今用

我们都知道，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积累了非常丰厚的传统文化。如何对待这个传统文化？这在理论上是早已有坚定共识的，那就是“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

根据这一共识，或者叫方针，五六十年来，专家学者只做了两件工作：一是评估，二是考证。在众多的人（包括我自己）看来，这两项工作必须要做：你不评估，怎么知道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你不考证，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所以大家认为，评估与考证具有前提性，必须先解决了前提的问题，才能谈到古为今用。

那么，评估、考证了五六十年，前提问题解决了没有呢？基本上可以说是没有解决。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得不出统一的结论。有时候好像有结论了，但“运动”一来又什么都变了。

比如《水浒传》,本来所有的人都认为它是歌颂农民起义英雄人物的,好得很 可是在‘ 文革 ’中,它却变成了一部宣扬投降的书，以致于掀起了一个“批水运动”。

《水浒传》作者施耐庵。关于其生平，目前有争论。但施氏生于元末明初，曾经活动于杭州等地，已达成共识。《水浒传》是经过长期的民间流传，由施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耐庵等在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等著作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该书描写了北宋末年“官逼民反”的情景。



《水浒传》

又比如杜甫，本来被评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有人还称他为“诗中圣哲”，可是后来这个人又写了一本书，把杜甫描写成一个顽固而反动的老地主。

杜 甫 （712—770），唐代诗人。字子美，诗中尝自称少陵野老。祖籍襄阳（今属湖北），自其曾祖时迁居巩县（今属河南）。杜审言之孙。继承和发展了《诗经》以来的优良文学传统，起着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有许多优秀作品显示出唐代由开元、天宝盛世转向分裂衰微的历史过程，故被称为“诗史”。



杜甫像

反之，本来被批判为形式主义、唯美主义的李贺、李商隐，却被说成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从思想到艺术又都好得不得了。法家与儒家，本来似乎人们看好儒家，而认为法家是为封建专制服务的；而在“评法批儒”运动中，“法家”却成了历史上一切进步人物的代名词，而儒家则反动透顶。到了现在，情况又变了，儒家的“行情”日益看涨，而法家则成了“垃圾股”，几乎没有人提了。



杜甫草堂

学术研究哪能这么搞呢？

李 贺

(790—816)，唐代诗人。字长吉。福昌（今河南宜阳）人。祖籍陇西，自称「陇西长吉」。家居福昌昌谷，后世因称他为李昌谷。李贺为唐宗室郑王李亮的后裔，但其家已没落。一生体弱多病，27岁逝世。《李贺诗集》收诗 223首 。

李商隐（约 813— 约 858），唐代诗人。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子。原籍怀州河内(今河南沁阳)，祖辈迁荥阳（今属河南）。李商隐诗现存约 600 首。对后世的诗坛和词坛影响很深。其诗七律成就最高，继承面较广。是晚唐骈文的代表作家。

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人们又怎么能把评估、考证当作前提来解决呢？解决了五六十年，「前提」问题没解决。这还算小事，更严重的问题是，传统文化的整体

离广大群众越来越远了，如果再搞五六十年，大概很多人就简直不知道传统文化是什么东西了。

“那么,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从今以后不要再搞评估、考证了呢？”这倒不是。专家、学者还是要继续搞评估、考证，继续搞“百家争鸣”，争论不休。学术研究嘛，应该如此。一个国家总要有人做学问，只要不是搞运动，不是随风转，而是严谨的评估考证，就一定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也有助于对传统文化的清理与重编。如果没有人继续研究了，那么几十年后，连古书的注释、翻译都没人能做了，古书变成天书，也没人能搞传统文化的交流了。所以阅读古书，评估考证等工作，今后必须继续有人做，最好是还要多一点人来做。

但是,这绝不是唯一的工作,对广大群众来说,要尽可能在传统文化的古为今用上下功夫。只要你觉得有用,拿来就用。比如你看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你就应该照办,因为不论什么时代都该如此,尤其现在强调‘求真务实”,更应该如此。

但是，传统文化中的确有糟粕，如果拿来就用，用错了怎么办？我认为不必害怕，因为在用的过程中还要根据其社会效果来区别好坏。这是最过硬的，因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群众性的古为今用是弘扬传统文化的唯一有效方法。专家学者总以为他自己的论文对广大群众的读书活动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其实情况并非如此。除了某些特殊原因之外，大多数人读书是根据有用没用、有兴趣没兴趣来读的。所谓有用,就是读了书

之后对国家、对人民、对社会、对工作以及对个人修养有好处。在这些方面，只要在某一点上读了书“尝到甜头”，那么这读书就可以持续发展了；假如由此而产生兴趣、增长学问，那读书的劲头就更大了。所以说“用”是读书的原动力。有句古话叫“书到用时方恨少”；从古至今都有人强调“学以致用”(《论语·学而》),这是很正确的，知识能用才是力量。

我们现在说学习传统文化，也是这个道理，在现实中使用了，才能成为力量，才能够传承与弘扬。再进一步说，假如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就连专家学者的队伍也会因后继无人而最终消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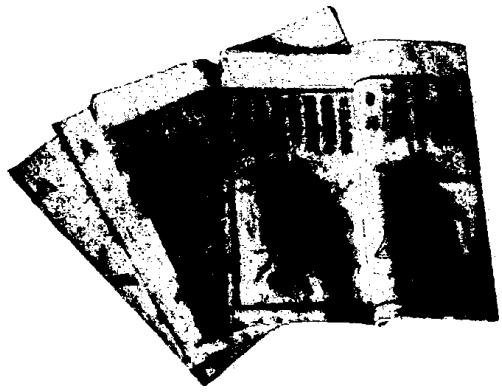
我如此强调古为今用，必须有一个真正的前提，那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确在今天有用，用了是真有好处，通得过实践的检验。否则，我强调古为今用岂不太坑人了？所以，我现在就要来证明它是真的有用，这证明还要从洋人的事例说起。

大家都知道，海外曾有过几次“中国文化热”，其实热的只是某一部书,如《三国演义》热,《孙子兵法》热，《菜根谭》热，等等。洋人把这些书用于“商战”，用于“公关”之类，觉得大有好处，于是就热起来了。这种用法是中国的评论家、考据家、学问家万万想不到的，甚至会认为是荒谬的。然而你怎么看没什么关系，反正他用了，而且热了。

《三国演义》作者罗本，字贯中，别号湖海散人，杭州人，祖籍太原，生卒年待考（1330？—1400？）。元末明初小说家、戏曲家。原称《三国志通俗演义》,今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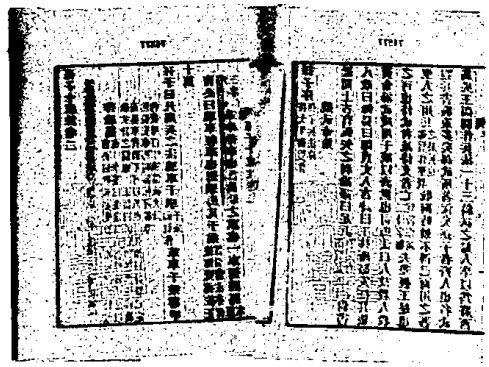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三国演义》。此书是根据讲史话本《三国志平话》进行剪裁、创作及全面艺术加工而写成的长篇历史小说，是章回小说的开山祖。小说描述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大封建统治集团间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或公开、或隐蔽的复杂斗争。



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孙子兵法》作者孙武，字长卿，春秋末期齐国人。公元前515年因避齐乱奔吴，至吴王阖闾三年（公元前512年）经其好友伍子胥推荐，将其所著《孙子兵法》二、三篇献给吴王，并在吴宫教战，实践了兵法之妙，被拜为将军，辅佐吴王，经军治国。联合唐、蔡二国于公元前506年，与伍子胥等率兵三万，经过五次大战，只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攻占了楚国的都城郢城，消灭楚军20余万。首创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绩。史称"：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伏越人，名显诸侯。'他所著的13篇兵法，便是不朽的《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

《菜根谭》作者洪应明，字自诚，号还初道人。生卒年月、籍贯生平现已无从考证。据推测，他很可能是余杭县人，为一位退出官场后久居山林的隐士。《菜根

谭》是一部论述修身、处事、待人、接物的格言集。书中的每则格言从数十字到近百字不等，共有360则。融儒、道、佛三家思想为一体，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结晶，既体现了儒家的中庸思想、道家的无为思想，还体现了佛家的出世思想。成为一种涉身处世、待人接物的方法体系。他流传至今的著作除《菜根谭》外，还有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仙佛奇踪》四卷。

毛泽东评价《菜根谭》："嚼得菜根者百事可做,读懂一部菜根谭，体会人生百种滋味，就能做到：风急雨斜处，立得脚定；花浓柳艳处，看得眼高；路危径险处，回得头早。"

"儒学热"(即儒家文化热)是一些海外华人搞起来的，目前还不能说有多大气候。但日本和东南亚的确有些企业想吸收儒家思想来营造企业文化，中国也有人想当"儒商"。

最不可思议的是美国有个大名鼎鼎的贝尔实验室，曾有过大量独创性的科技成果，却把"无为而治"四个大字当作"治室之道"。这四个字虽然不是《老子》的原话，但的确是老子的思想，而且在中国已成为一句成语，可以说是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文化。可是中国人却没有想到"无为而治"竟可以用来管理科技研究。

老子（约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楚国苦县（今鹿邑县）人。老子遗留下来的著作,仅有《道德经》,也叫《老子》。《老子》一书是一个唯物主义体系，并具有朴素辩证法思

想。它宣扬自然、无为的天道观和无神论。其唯物主义体系的核心是‘道’,老子反对天道有知，提出了天道无为的思想以及‘道常无为,而无不为’的思想,即道是构成万物的基础，道并不是有意志、有目的地构成世界万物，道是世界万物自身的规律。



老子像

洋人对中华传统文化作如此这般的运用，可以说与传统的所谓“学问”大不相同,但他们通过古为今用,的确发掘出了蕴藏在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中国人的智慧，起到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作用，用得很活。

下面，我再说说中国人对传统文化古为今用的三个范例。

第一例,是邓小平从中华传统文化中选用了‘韬光养晦’四个字,用来指导我们在对外关系中的心态和姿态，这不但使国家深受其利，也使广大人民深受其福。现在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想与我们拼个你死我活、鱼死网破,都表示要和我们做朋友。这就因为我们是韬光养晦的,我们从未凭借日益提高的国力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相反,我们总是呼吁

和平，在国际事务中力求公允。对比那些一心想要独霸世界而终于一再陷入难以自拔的尴尬处境的人来看，韬光养晦真是太聪明了，中华传统文化实在是一种高度智慧型的文化。

韬光养晦语出《唐书·宣宗纪》愈事韬晦，群居游处，未尝有言。韬，隐藏，韬光，即把才华掩藏起来；晦，含蓄，养晦，即隐居待时。韬晦，收敛锋芒、踪迹，隐匿光彩、才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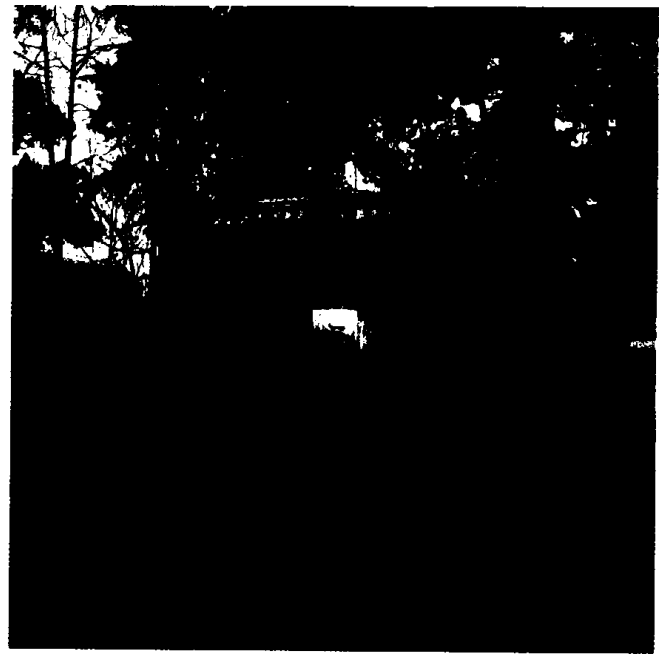
孔子像



第二例，是江泽民于2002年10月24日在美国作演讲，引用孔子的名言“君子和而不同”。指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

孔子（公元前551年一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相传有弟子三千，贤弟子七十二人。教育上首倡有教无类及因材施教，打破贵族垄断知识之局面，首开

私人讲学风气的先河。后人尊为万世师表及至圣先师，历代帝王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孔子还是一位古文献整理家，曾修《诗》、《书》，定《礼》、《乐》，序《周易》，作《春秋》。孔子的思想及学说，对后世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孔庙内的鲁壁：秦始皇焚书坑儒时，孔子第九代孙孔鲋将《论语》等儒家经册藏在一堵墙壁中，直到汉代这批所谓“鲁壁藏书”方被发现。

和而不同语出《论语·子路》：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和睦；“同”，苟同。和睦相处，但不苟同，尊重差异，崇尚和谐。

第三例，是李瑞环2002年5月28日在英国演讲时，指出“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接着谈到“和实生物”、“和为贵”、“和而不同”等重要思想以及和谐、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义。结论是一个“和”字“蕴涵着和以处众、和衷共济、政通人和、内和外顺等深刻的处世哲学和人生理念”。

和实生物　语出《国语·郑语》：和实生物，同

则不继”;“和”,指不同的事物汇聚、结合在一起,得其平衡、协调，相济而相成，这样才能生机盎然，产生新的事物。

和为贵语出《论语·学而》“礼之用,和为贵”,意为社会秩序的作用，贵在使社会和谐。

江泽民、李瑞环这两篇演讲都有很大的影响，使世界各国的众多人士进一步理解了中华民族，进一步亲近了中国，所以是古为今用的范例。

除此之外，我还常常注意到一个事实：当有些人在外事活动的特定语境中，说套话、空话、大话均不得体的时候，就巧妙地运用传统文化的名句、格言来应对、交流，往往能收到很好的效果。这些事例都说明，传统文化的确能够古为今用。

现在古为今用这个问题，还出现了新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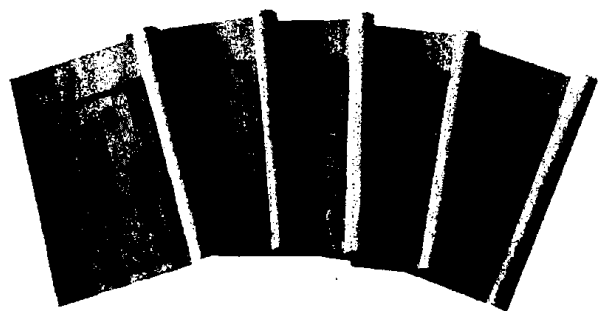
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世界范围逐渐流行一种“接受理论”,它与信息论、符号学、诠释学、传播学等都有联系，甚至关联着心理学、语言学中的一些理论，从而扩展到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接受理论”相当复杂，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就是任何信息的意义和作用，并不完全取决于信息源（原发部位），而是很可能在传播与接受的过程中发生种种变化。

比如拿传统文化中的核心部分即古代典籍来说,古籍的文本就是信息源(原发部位),但一百个人来读这个文本却可能有一百种理解,在多种不同的‘语境’(包括不同的时间或空间）中来接受文本的信息，也可能产生

多种不同的感受与理解，从而起到种种不同的作用。

我对这种理论有较大的认同感。试想一部《诗经》，光是古代注释就有三千多种，《楚辞》的注本也有近三百种。所有重要的典籍几乎都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注释，并且新的注释还在不断地出现。注释者就是接受者，不同的注释就是对文本的不同诠释，可见‘接受理论’是有事实根据的。尤其是假如不从纯学术的角度，而是从社会作用的角度来看，接受的效果是更值得重视的。

《诗经》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原本叫《诗》，共有诗歌305首（另外还有六篇有题目无内容，称为笙诗），因此又称‘诗三百”。从汉朝起儒家将其奉为经典，因此称为《诗经》。



《诗经》

《诗经》中的诗作者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诗经》对中国古代诗歌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孔子对《诗经》有很高的评价。

《楚辞》由西汉刘向编定，为辞赋的一类。起源于战国时楚国，是在楚国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完全有别于《诗经》的创作形式，经屈原之手而发扬光大，形成一种流行的诗歌体裁。以屈原的《离骚》为代表作。后世多以《离骚》为楷模，故名骚体。

通过实例来看，孔子及其弟子强调“克己复礼”

(《论语·颜渊》)。这个“礼”的确是指‘周礼’,也就是奴隶社会等级制度的政治表现和礼仪表现。所以,“克己复礼”可谓糟粕中的糟粕。但是时至今日,恢复周礼已全然不可能,任何一个神智正常的人,也不会去想要恢复奴隶制社会。在漫长岁月的冲洗之下,‘礼’这个符号的“所指”已经大大抽象化了,它不再代表“周礼”,而是泛指礼仪、仪式,而任何的礼仪、仪式都是反映社会秩序的。所以,“礼”已经是一般的社会秩序的代称或标志,而不再专指“周礼”了。

既然如此,我认为“克己复礼”应该可以古为今用。这就是说,为了维持社会秩序以求安定,每个人对自己的欲望与行为都应有所克制,而不能为所欲为。现在社会中的有些人就太任性,想怎样就怎样,比如在媒体的法制报道中,常常可见有人为了一点小事、一点小利就伤人、杀人。所以如果说‘复礼’可能引起误解,那么至少‘克己”二字仍应该得到重视。“克己复礼”还是很有针对性的。

过去的评估只讲文本是优是劣,却不管在接受中产生什么效果。现在讲古为今用,主要着眼于接受效果。与“克己复礼’模式相链接的还有‘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现在“和为贵”三个字还从原文中剥离出来单独流传,还有“礼义廉耻(秩序、公理、廉政、知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管子·牧民》)。这些“礼”字,本来也指周礼,现在经过抽象,也是指社会秩序而言,都已成了思维模式,适用于各个时代。

《论语》记载孔子及其学生言行的文集。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是孔子的学生及其再传学生所记录整理。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